

致力为公 建言献策

◇ 曾仁端

人物名片：曾仁端，1934年出生，印度尼西亚归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致公党武汉市委第一、二届副主委，曾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我加入中国致公党，有幸做了一些工作，得到致公党湖北省委会和武汉市委领导的肯定，2006年被推荐为中国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我一生的最高荣誉。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一生，那就是：只要努力过就好，尽力就行，结果不是最终目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三次人生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祖国的声望在国际华人社会中越来越大，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

行员张积慧把美国“二战”时的飞行英雄戴维斯打下来了，让许多华侨华人感到无比自豪。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刚高中毕业的我，与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一样选择回国，立志学好本领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20世纪70年代，因“文革”许多一起回国的同学又纷纷离开了祖国，他们站在深



2021年，曾仁端留影

圳罗湖桥上，回望祖国眺望五星红旗时，热泪盈眶地说：“亲爱的祖国，我们向你告别了。”是出去还是留下？我又一次面临选择。现在虽然生活艰苦一些，但没有失业风险，我深信只要努力，勤奋做好本职工作，留下来也大有可为。于是我坚定地作出选择，留在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我从一个连普通话都讲不清楚，对祖国一无所知的海外青年，变成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1987年，我被全校师生员工经过差额选举，选为硚口区人大代表。当选人大代表后，经常有机会参加视察，在多次参加视察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广大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特别是一些老工人，他们说共产党真好，让他们这些退休了的人，每个月都能按月足额领到退休金，生活无后顾之忧。为此，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1988年，同济医科大学负责人找我谈话：“你是归国华侨，又是教授，建议你参加中国致公党，在那边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深入了解中国致公党的发展历程之后，我做出了人生第三次重要选择：加入中国致公党（当时是致公党武汉市工作委员会）。

1993年、1998年，我两次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又成为致公党武汉市委副主委。我深知绝大多数代表、委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代表、委员工作的关系，一直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多年的实践中，我有一句口头禅，叫“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本职工作上，我每年都能比较好地完成本科生“医学物理学”和研究生“人体图像学”的教学工作，并多次被评为课堂教学优秀教师；培养了12名硕士研究生，

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临床医学专业使用的规划教材《医学物理学》（从第二版至第六版）一书的编写，主编《现代医学成像的物理学原理》（科技出版社出版），参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腹部B超诊断学》等25本书的编写工作。先后在《世界医疗器械》《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等期刊发表10多篇论文。参加、主持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和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被推荐担任中国医学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也就是说，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基本上没有影响我的本职工作。1991年，我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终身成就奖。

致公党这个平台，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这个平台上，我提出的议案、提案和反映的社情民意，被采用达到200多件，其中有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批示，有省长和副省长的批示。后来组织推荐我参加2006年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作贡献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我荣获先进个人称号，受到贾庆林、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致公党中央给我颁发奖牌。

提出“武汉降温工程”议案

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市对外开放比较滞后，政府部门号召大家通过海外关系引资，许多人便把目光盯向我这个有涉外关系的致公党员，让我感到了压力和责任。于是，我邀请1955年同我一起回国读大学，后在70年代初又出去，在香港开了工厂、办了企业的两位同学来武汉参观。当时他们都面临企业搬迁问题，到武汉时正是六七月份，

乘坐“麻木”在武汉到处溜达，离开武汉时对我说：“你们武汉人很朴实，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九头鸟那么难对付。”不过，最后还说了一句话，“武汉真是名副其实的火炉城市。”听到这话我很有一点失望。

后因工作关系到长春、南京等地出差，发现这几个城市的城区植树造林很不错，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在林荫大道上走路也不感到太热。回到武汉后，我一直在想，植树造林对城区地面温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于是在39℃的夏天，我带着两名研究生，自制实验支架和百叶箱，到武汉的街头巷尾，在大树下、大桥面上、草地上测量温度。从几百个数据中，发现绿化对地面温度的影响不可忽视，有的地方相差超过10℃。

在1996年市人大会上，我会同代表提出以保护和扩大公共绿地为核心的“降温工程”议案，被列入当年市人大四大议案之一；1998年提出“建设山水园林城市”议案，又一次被列入市人大议案之一；2002年提出“绿在武汉，城在林中”议案，再次列入市人大议案。一场“城在林中”的植树造林活动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展开。《武汉晚报》用全版篇幅推出《从“降温工程”到“绿色武汉”——三提议案寻“绿色”》对我进行了报道。降温工程议案后来被武汉市44万张选票评为市民最满意十大人大代表议案之一。



1997年1月23日，长江日报头版刊登



2002年5月，曾仁端荣获市人大颁发的三项市民最满意的人大议案奖牌

时隔16年的2012年10月10日《武汉晚报》，刊发了《人大议案显功效，武汉摘掉三大火炉帽》报道。据国家气象局发布的“中国炎热榜”，武汉已摘掉“三大火炉”的帽子，排名由前三名往后移到第六名，并说这与我1996年领衔提出的“大力开展城区绿化造林，实施武汉地面降温工程”议案有直接关系。这个议案产生的过程，使我深深意识到，参政议政与做科学研究、撰写论文一样，要把它当学问来做，要进行实验，要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查阅文献，掌握有说服力的依据，提出的建议才切实可行。

要维护法律尊严

1998年的特大洪水给武汉带来巨大损失。1999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防洪问题，都在组织学习防洪法。此时我们学校正与华中理工大学准备合并事宜，我有机会经常到华工去开会，无意中看到长江大桥汉阳一侧正在动工建几栋商品房，而且听说该处还准备建一大排沿江商品房。

当时，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正在学习全国、省、市的防洪法，该法明文规定在河道内禁止建商品房。我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提出，汉阳江滩河道内建商品房是否与防洪法

相悖。第二天《武汉晚报》刊发《人大常委会质疑汉阳江滩建商品房》报道。这篇报道出来后，开发商找到我，说江滩商品房建设是经省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亲自批准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从国家到地方的防洪法规都有明确规定，而汉阳江滩则在河道内建商品房还有各级领导批文。

后来我了解到，那些主张在河道内建商品房的组织和管理者，确实是想发展建设武汉市，他们提出防洪和发展建设武汉两不误的口号，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违法或从中获利。那么，该如何来反映这个问题呢？经过反复思考，在2001年武汉市人大会议上，我联袂代表提出议案《不宜鼓励在河道内建商品房》。内容主要是针对长江大桥汉阳一侧动工建设商品房，认为在河道内建商品房，违反国家、省、市防洪法规定；如果可以在长江河道内建商品房，发展下去长江的江面不是越来越狭窄了吗？我们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建议有关部门认真学习防洪法，立即停建商品房，杜绝这类事情继续发展下去。

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找到我，我向记者谈了这份议案产生的经过，没过几天《焦点访谈》对此进行了曝光，最后河道内的商品房一夜之间全部炸掉。现在回想起来，商品房炸掉后，损失虽然巨大，但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朱镕基总理专门为此事作了批示。

提案得到国家领导批示

我长期工作在高校科研第一线，亲身感受、亲眼目睹国家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存在一些漏洞。2003年，我带的一研究生所选论文课题，是当时国内外文献还没有解

决的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实验，我想为她申请一部分研究经费。但按规定，研究生的课题经费应由导师解决，我只好用自己有限的经费帮助研究生完成课题。而就在同年，上海某大学一位院长伪造“汉芯一号”，申请到上亿元的研究经费。

这让我心里很不平衡，感到急需的科研申请不到经费，弄虚作假的可以申请到大笔经费，再看到一些申请到经费的人，对经费的使用也很随意。我认为国家科研经费审批和管理制度存在弊端，于是在2007年省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的建议》，在建言部分提出规范审批程序、加强追踪管理和科研成果打假三点建议。该提案的内容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在《互联网信息摘要特刊50期》也转载这份提案，报送国务院后还得到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等领导的批示。

为了贯彻温家宝、陈至立同志批示精神，科技部、财政部专门派领导到湖北省召开座谈会，与致公党地方领导和提案撰稿人面对面座谈。后来国家正式出台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高校的科研经费管理逐步有序推进，维护了高校这块净土。

1999年到2008年，我先后担任基础医学院（3年）和同济医学院（5年）的教学督导组成员，在整整8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听过所有基础和临床医学课程，参加过医学院、药学院和同济协和医院许多科室的教学活动，了解到医学教育的整个过程。由于有这段经历，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反映许多医科大学生高转行率问题，我在2012年提交了一份社情民意，题目叫《改革医学教育化解医科大学生高转行率》，这份信息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批示。



一份提案促成一个产业

2008年，湖北大力提倡建设“两型”社会，节能、环保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电子垃圾问题已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我撰写了一篇社情民意，提出要关注电子垃圾回收与利用，使之步入循环经济轨道。这份信息得到时任副省长赵斌两次批示。

在督办这份社情民意信息时，省政府责成武汉市先从手机电池、助动车电池、母子机电池回收、处理抓起，然后一步一步抓其他电子废品回收、拆卸，使之产业化，步入循环经济轨道，并提炼出各种贵金属和其他有用材料，充分发掘武汉这座城市亟待开发的“金矿”。2011年，湖北省引进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武汉分公司，专门从事废旧电子产品的拆卸和重金属回收，企业发展比较快，也发展得比较好。

2014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格林美武汉分公司考察废弃物的绿色回收利用。生产线上一台台废旧冰箱、电脑、电视机被拆解，铝、铜、塑料等被回收。习近平总书记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再接再厉。”

一份社情民意为一座城市催生一个产业，何其荣幸。

2007年2月28日，曾仁端呼吁科研经费加强管理的报道

这份社情民意中反映，我国各级医学院校每年招收医学生约60万人，最后只有约10万人能成为医生，就是说有高达六分之五的医学生转行。一方面是医学生高转行率，另一方面是广大乡村医生极度缺乏，基层和农村群众就医难。我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化解这道难题。

为此，我提出建言：一是医学教育要改革；二是临床实践要加强；三是医生收入要提高；四是医疗风险要防范。最后说明医学教育改革的目標，在营造尊重医学、尊重医生风气、提高医生收入等问题上更具合理性，促使医生诚信行医、依法行医、有尊严行医，医科大学生高转行率的问题才会得到有效遏制。

这份社情民意是我担任8年的教学督导组成员期间，注意了解医学教育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动态，积累收集相关材料，思考其发展趋势和应注意的问题，融合自己的专业视野和独到见解提出来的，而且是各级政府一直重视、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领域，所以才会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